

守护乡村的绿骑士

——帕特里克·卡瓦纳田园诗研究

刘庆松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守护乡村的绿骑士

——帕特里克·卡瓦纳田园诗研究

刘庆松◎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JC15N08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护乡村的绿骑士: 帕特里克·卡瓦纳田园诗研究 / 刘庆松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 10

ISBN 978-7-5613-7731-4

I. ①守… II. ①刘… III. ①卡瓦纳, P. (1904 ~ 1967)—田园诗—诗歌研究 IV. ①I56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770 号

SHOUHŪ XIANGCUN DE LVQISHI PATELIKE KAWANA TIANYUANSI YANJIU

守护乡村的绿骑士

——帕特里克·卡瓦纳田园诗研究

刘庆松 著

责任编辑	杜莎莎
责任校对	郭媛
封面设计	王渭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731-4
定 价	2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26 传 真:(029)85303622

序 言

叶芝、卡瓦纳与希尼被公认为 20 世纪爱尔兰最重要的三位诗人。2000 年,《爱尔兰时代》杂志刊载了最佳爱尔兰诗歌排行榜,在最佳 50 首中有 10 首是爱尔兰作家帕特里克·卡瓦纳的作品。

卡瓦纳生活在大诗人叶芝的光环下却独树一帜,被誉为爱尔兰北方文学复兴的鼻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声称,卡瓦纳的诗歌“对于总的文化具有一种变革的作用,释放出后代诗人的天分”。他认为卡瓦纳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物,他的颠覆性从自身开始。他对于精神与艺术上的不满是他成长的灵感。^①

然而,这么一位重要的爱尔兰作家在中国却鲜为人知。且不说中国普通读者,即使在国内的外国文学评论界,了解或者哪怕听说过卡瓦纳的人也寥寥无几(中国知网迄今只有三四篇论述卡瓦纳的文章)。一方面,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同为爱尔兰诗人的叶芝可谓大名鼎鼎,另一方面,文学成就与声誉仅次于叶芝的卡瓦纳却如此默默无闻,如此冰火两重天。尽管卡瓦纳研究在国外也算不上什么显学,但国内学术界对其的重视程度与研究力度的确与他在爱尔兰文学中的成就和地位极不相符。刘庆松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敏感地注意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一不寻常现象,于是开始重点关注卡瓦纳的诗歌创作,最终确定将卡瓦纳的诗歌创作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卡瓦纳是农民的儿子,最熟悉的是农村的生活与生活在农村的人,因此,他的诗多以农村为背景,描写农人的生活,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用老百姓的语言描写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这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极力推崇的。刘庆松博士的研究重点即是卡

^① Seamus Heaney, "Review: *Collected Poems* by Patrick Kavanagh," *The Guardian*, London: Jan. 1, 2005.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5/jan/01/poetry>. Retrieved 2013-2-12.

瓦纳的田园诗,诚如他在本书绪论中所言,卡瓦纳“创建了独树一帜的田园诗模式……大大拓宽了该体裁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卡瓦纳田园诗或反田园诗的研究在国外学术界并不少见,但运用对立模式系统研究卡瓦纳田园诗中教区与地区、童年乡村与成人世界、田园与反田园、自然与城市等对立与冲突的规律,从而揭示转型期爱尔兰社会的精神诉求——这是本书的原创,也是对卡瓦纳研究的贡献。刘博士的论著建立在文本细读之上,分析入理、文笔细腻,附录中自译的卡瓦纳著名长诗《大饥饿》也流畅可读,显示出译者不俗的文字功底。稍觉不足的是尽管论著的结论部分提及了中、西田园诗的异同,却没有进一步指出卡瓦纳对中国当下文化建设具有何种启示与借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问题。当然,刘博士在论著中表达了这种希望,我们期待他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思考、深入研究,阐明卡瓦纳对中国当下文化建设的启示与借鉴。

在中国研究卡瓦纳,刘庆松博士面临的困难不少。比如,缺乏前人研究的基础与借鉴,无论第一或第二手资料都较为匮乏;而且他考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已近不惑之年,本应成业稳家,按部就班,却毅然告别妻子,离家求索,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着实不易。凭着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精神,相信刘庆松博士在今后治学授业的道路上会有更大成绩。

是为序。

李公昭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六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卡瓦纳:生平、创作及与传统的关联	20
第一节 卡瓦纳的生平与创作	20
第二节 卡瓦纳田园诗中的传统因素	23
一、古典文化与基督教的乐园模式	24
二、英国浪漫主义传统	26
第二章 乡村与宗教田园诗	34
第一节 田园与教区	35
一、有限的田园,无限的教区	36
二、作为“我们的一员”的上帝	46
第二节 童年乡村与成人世界	57
第三章 反田园诗与反主流意识形态	70
第一节 反田园诗与反“伪乐园”	70
第二节 《大饥饿》中的反田园成分	76
一、没有夏娃的亚当	77
二、泥土是道	83
第三节 被颠覆的新耶路撒冷	90
第四节 从反田园到喜剧幻景	96

第四章 后田园视界	105
第一节 后田园诗的前奏	107
第二节 城市田园诗	114
一、在城市所发掘的自然之道	115
二、城市自然物的媒介作用	121
结论	126
参考文献	134
附录	141
附录一 与田园诗相关的术语	141
附录二 大饥饿	142
后记	169

绪 论

田园之神潘的身影有时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而导致田园诗^①的沉寂,其实他只不过是隐匿在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并常在不经意间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与英国颇有纠葛冲突的一些相对落后的凯尔特地区,如爱尔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等地,田园诗一挽颓势,勃然兴起,并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发展势头。田园诗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吟咏自然风光、悲悯躬耕于田亩的艰辛、同情因圈地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和诅咒奢侈歌颂节俭,而是在各种文化思潮的激荡下,把视野扩展到宗教、意识形态、城市、生态批评、民族主义、历史等领域的深层探索上,使得这一体裁的内容和形式都得以大大拓展。

田园诗传统之所以能在上述那些边缘地区发扬光大,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第一,凯尔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统的农耕方式仍然大行其道。机器虽然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但在一些落后地区,包括丘陵、沼泽等地带,农民依旧胼手胝足,操作着那些古老的农具。在这些较多地保留了古朴风貌的乡村地带,田园诗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从中吸取天然丰厚的养料。

第二,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在此地得以保留。在上千年的沧桑历史中,虽屡经刀兵屠戮、战火洗劫,凯尔特文化特质始终得以存续,神话、传说、传统习俗代代相传。即便厚重沉滞的沼泽地也成为缪斯的栖居地,生发出诸多灵感和想象。

第三,不平凡的历史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凯尔特地区与英格兰有着千百年的矛盾冲突,弱小民族可能经历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刺激了长久压抑的情感,沉默的土地开始了倾诉,被洗劫的田园开始重建。

第四,田园诗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宗教因素,而在凯尔特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天主教文化源远流长,对田园诗的繁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除了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外,本书探讨的田园诗都指西方田园诗。

第五,对立和冲突持续不断。城市生活方式对乡村的盘剥、工业化对田园的破坏、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领土之争,构成了田园诗中的反田园成分。

这承载着过重历史负荷的凯尔特地区输送的优秀田园诗人,有的出身农家,在城里接受教育,其创作却深深地扎根于土地;有的虽长于市镇,却终其一生在乡村传教、隐居;有的出生于乡村,在田地里劳作数十年。爱尔兰作家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 1904—1967)正是一位一手把锄犁、一手握笔杆的乡村诗人。

卡瓦纳深受英国与爱尔兰田园主义的影响,并汲取了本土爱尔兰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主教有益的成分,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独树一帜的田园诗模式——涵盖了宗教田园诗、反田园诗与后田园诗三种亚类,从而大大拓宽了该体裁的内涵和外延。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田园诗》(*Pastoral*, 1999)一书中列出了三种田园诗,即传统田园诗、反田园诗和后田园诗。田园诗指的是描述乡村的文学,含有隐晦或明显的与城市的对比,传统田园诗把乡村生活理想化;反田园诗总是拒斥田园诗传统,并拒绝把乡村生活理想化;而后田园诗范围则包括了自然、文化、生态、女性等领域。^① 本著正是依据吉福德的分类法来对卡瓦纳的田园诗进行划分的,但后者的诗歌体现出很多特质,并没有涵盖在前者的理论中,这从本著第二、三、四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田园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初主要描写牧羊人的纯朴生活环境与复杂、腐败的城市生活的对立,这是它原始的也是最根本的对立模式。田园诗的传统和主题主要是由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前300—前250)确立的,他的《牧歌》(*Idylls*)是最早的田园诗歌的典范。这个传统从希腊传到罗马。维吉尔(Virgil, 前70—前19)用暗示手法影射他描写的乡村社会当时存在的土地问题、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他的《牧歌》(*Eclogues*)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中世纪评论维吉尔的基督教评论家和《旧约》《新约》中的田园情景(该隐和亚伯、大卫、伯利恒牧羊人以及基督这位优异的牧羊人)则使得田园诗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成分。^②

忒奥克里托斯之前所谓的田园诗歌只是一种与音乐结合起来的民间创作,而忒奥克里托斯将它彻底转化为一种纯文学体裁。他的田园诗一点也没有后

^① 详见 Terry Gifford, *Pastoral*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3, pp. 152-165.

^② 详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2版·修订版)第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世田园诗那种人为的美,这是由于他的农民感情和他无力控制的语言。^①在他之后,田园诗派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欧洲文学中的主流体裁。

英国早在16世纪初期就有了田园诗,随后出现了多种流派,如文艺复兴田园戏剧、新古典主义田园诗、浪漫派田园诗等。英国是田园大家萃集之地,斯宾塞、弥尔顿、蒲柏、哥尔斯密、华兹华斯、丁尼生等大诗人的传承创新,使得英国成为田园诗最为丰沛的一个支流;田园诗传统焕发了崭新的生机,并推动了爱尔兰、美国等国田园诗的发展。19世纪,田园诗渐趋式微,但其传统仍得以延续。而到了20世纪,田园诗重振雄风,尤其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凯尔特地区。著名的凯尔特田园诗人除卡瓦纳之外,还有威尔士的罗·斯·托马斯(R. S. Thomas)和北爱尔兰的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人。

田园诗的兴起引发了研究者与评论家的极大兴趣。西方田园诗的研究历久不衰,虽然有着波动起伏,但总体上呈现的是螺旋式上升趋势。英国的田园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20世纪,而美国、爱尔兰等国的相关研究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作为对主流观念的反拨,田园主义理论也应时而变。比如,前浪漫主义感伤派田园诗的主题之一是自我意识萌醒的乡村与奢侈生活方式的对抗,浪漫主义的一个主题是毁掉的乡村英格兰与工业社会的对抗,而后浪漫主义则常展现凯尔特乡村情结与英格兰城市文化的对抗。^②

英国三个时期的田园诗研究体现出各自时代的审美取向。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注重田园诗的古希腊罗马传统,把田园诗看作对牧人行动的模仿,是所谓黄金时代的映象。他认为:我们必须运用某种幻想使田园诗变得欢快;这在于仅仅展示牧人生活最好的一面,而隐藏其中的痛苦。^③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论田园诗和乡村生活》(1750)中认为:从维吉尔的作品可以看出,田园诗的真正定义是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感受来描述任何行动或激情。^④田园诗不排除对情感的提升或使之变得雅致;某些

① “忒奥克里托斯”,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2版·修订版)第1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② 详见拙作:《英国乡村题材诗歌的浪漫对抗》,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0—104页。

③ 转引自 Bryan Loughrey, ed.,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p. 50-51.

④ Samuel Johnson, “On Pastoral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67.

思想——因其不是源自乡村对象，与田园无关——只能是不适宜的。^① 约翰逊严格地把田园诗与乡村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乡村别墅诗把乡村田园化、理想化，以此表达对工业社会的不满和对贵族生活的留恋，但对乡村的真正痛苦则视而不见。新古典主义后期出现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成分的田园诗，如乔治·克雷布 (George Crabbe) 的反田园诗《乡村》(The Village, 1783) 就强调了穷人的道德堕落。

浪漫主义致力于描写真实的乡村生活，但依旧田园化乡村。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把“微贱的田园生活”看作本真激情和纯化语言的蓄水池，“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②。因而，他在描述乡村生活时，把现实主义与田园化合二为一。《抒情歌谣集》肇始了对农民和乡村生活态度的改变。从华兹华斯开始，传统田园诗变成了一种与真正乡村生活紧密融合的田园诗，田园诗的主角不再是过去作品中披着牧人外衣但并不以放牧为业的人物，就像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的《利西达斯》(“Lycidas”, 1638) 或蒲柏的《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 1713) 那样。传统田园诗逐渐变形为体现出浪漫理想的现代或现实主义田园诗。华兹华斯在 20 世纪的一大传人正是卡瓦纳，当然名单上还可以列入弗罗斯特、罗·斯·托马斯、希尼等。但华兹华斯的田园诗对立模式主要是乡村和外部影响的对立，而熟谙乡村内情的卡瓦纳聚焦的既有田园世界对外来势力的抗拒，也有内部的冲突。

19 世纪极少有批评家认真地讨论田园诗。然而，在 20 世纪，批评家对这一文类的兴趣又重新产生了。田园诗的对立模式得到进一步深化——几乎所有的现代批评者都认为，田园诗中的恒定因素，它的发人深省的意图，是“识别存在于田园生活和某种更复杂的文明之间的隐晦或直露的对立”^③。批评家从诸多不同的角度阐述田园诗的对立。这一时期的评论蔚为大观，基本上还是从田园诗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两大来源出发，结合诸多的文化和文学理论进行分析。相关的论著层出不穷，较为知名的有威廉·燕卜逊 (William Empson) 的《田园诗的几种类型》(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1935)、理查德·哈丁 (Richard F.

① Samuel Johnson, “On Pastoral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69.

② [英] 威廉·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王元春、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曹葆华、吕国军、汪培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15—16 页。

③ Bryan Loughrey, ed.,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p. 19-20.

Hardin)的《田园诗的留存》(*Survivals of Pastoral*, 1979)、布赖恩·劳瑞(Bryan Loughrey)的《田园诗模式:专题资料汇编》(*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1984)、特里·吉福德的《田园诗》等。劳瑞、吉福德等评论家承认田园世界遭受了巨大破坏,存在着极大危机——这也导致田园诗和反田园诗的交相呼应——但认为田园诗不会消亡,因为它寄寓着人类对乐园的信念。可见,田园化、理想化的观念是每个时代不衰的主题。

20世纪理论流派迭出,使得田园诗的评价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格雷格在《田园诗和田园理想》(1906)一文中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意识对于一种独特的田园诗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对立是各种次要类型的源头,如激起回归朴素欲望的理想型,以情感引发想象的现实型,讽刺做作、腐败文明的讽喻型。^①

田园诗并不只是描写乡村纯朴的生活和牧人劳动、歌唱、谈情说爱的情景,在单纯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与复杂世事的对立。燕卜逊认为,田园诗是化复杂为单纯的过程。^② 社会底层明显单纯而天真的性格是作家探索社会复杂观念的媒介。老派田园诗给人的感觉是暗示贫富之间的美好关系,其根本的诀窍在于让单纯的人们用有学问的、时髦的语言表达强烈的感情。^③

奥登的《阿卡狄亚和乌托邦》(1948)提出了卓有创意的观点:没有痛苦和罪恶的乐土的梦幻画面有两种——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阿卡狄亚人对世界的反映是审美的,乌托邦人则是政治的。阿卡狄亚人最中意的白日梦是关于伊甸园的,乌托邦人最中意的白日梦则是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④ 经历了世界大战浩劫的奥登把理想寄托在复乐园,而乌托邦却可能有黑暗面,比如政治清洗。奥登在区分了审美的和政治的乐园的同时,也给异教的阿卡狄亚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染上了基督教的色彩。

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也衍化出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哈里·莱文在《黄金时代》

① W. W. Greg, "Pastoral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81.

② 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68), p. 23.

③ 转引自 Bryan Loughrey, ed.,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11.

④ Wystan Hugh Auden, "Arcadia and Utopia",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90.

(1970)一文中认为,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有黄金时代。^①彼得·马利奈里在《退隐进童年》(1971)一文里指出,童年和田园诗的结合从忒奥克里托斯的《牧歌》起是隐晦的;阿卡狄亚^②的黄金牧场已经让位给童年的黄金时代;对童年的强调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创新,这一创新基于一种观念,即儿童清晰自然的幻想略微优于成人的幻想。^③劳瑞认为,很可能最有影响的新田园主义是儿童崇拜;后浪漫主义视儿童为一种自然的天真、欢快和智慧的状态,因步入成人世界而败坏,这种观念允许儿童篡夺牧人的传统角色;如果童年是阿卡狄亚的存在,那么我们都有过黄金时代的直接经历,怀旧因而是大多数田园诗的情感核心。^④

劳伦斯·勒讷在《田园诗世界:阿卡狄亚和黄金时代》(1972)一文中指出,如果诗人不是通过热切的眼眸,而是带着恐惧或厌弃的目光看待乡村,如果他看重王室的气度和优雅,并时不时地嘲笑粗俗的乡巴佬,这样的作品可被称为反田园诗。基督教版本的丧失的乐园是伊甸,田园诗版本的是阿卡狄亚(如果考虑的是地点)或黄金时代(如果考虑的是时间);对基督徒来说,将来的乐园是天堂(如果在另一个世界)或新耶路撒冷(如果在这个世界),世俗的叫法是乌托邦或国家的消亡。^⑤如同奥登一样,勒讷也区分了两种乐园,但却是截然分明的异教和基督教的乐园。异教版本的两种乐园缅怀过往世界,而基督教的则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两种乐园。

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认为,田园主义是文化的关键要素,西方思想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依赖它而存在。田园主义颂扬自然及乡村的道德风尚,反对城镇的风气。^⑥田园诗表面上反映的是城乡之间的对立,其实包含了天真与

① Harry Levin, "The Golden Age",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120.

② 阿卡狄亚(Arcadia)(本书写作“阿卡狄亚”),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山区,阿卡狄亚人与世隔绝,过着牧歌式的生活,因此,古希腊和古罗马田园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将其描绘成世外桃源。详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2版,修订版)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③ Peter V. Marinelli, "The Retreat into Childhood",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p. 130-132.

④ Bryan Loughrey, ed.,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21.

⑤ Laurence Lerner, "The Pastoral World: Arcadia and the Golden Age", in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ed. Bryan Loughre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p. 136, p. 147.

⑥ 转引自 Terry Gifford, *Pastoral*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4.

经验、单纯与世故、正与邪的对抗,它体现的田园理想和对乐园的信念是世人希望之所系,也是卡瓦纳的喜剧幻景的根基。由此可见田园诗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有论者贬低田园诗的作用。罗杰·塞尔斯(Roger Sales)认为田园诗代表了“五个 R”——避难所(refuge)、反思(reflection)、拯救(rescue)、挽歌(requiem)和重建(reconstruction),但它拯救的是老旧的价值观,重建的是更为复杂的现实。塞尔斯甚至指责说,这一文类开始被用来阻止对权力结构——巩固了土地所有权以及社会的整个构架——的质询。^①对同一首田园诗,有的人可能从中看到了乐园的所在,有的人却窥见了麻痹人心的一面。也许这正是田园诗内涵的丰富性之所在,但也说明对田园诗的解读,不同出身、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论家可能会有着迥异的观点。

出身于乡村,并度过数十年耕读生涯的卡瓦纳对于田园主义自然有着独到的阐释。他有资格宣称:“我是我们时代唯一从内部来写爱尔兰乡村的人”^②。他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田园诗人,语言粗朴、浑厚,写出了原生态的爱尔兰乡村性。福斯特认为,卡瓦纳像个喜剧替罪羊,在其创造的形象中展示出粗俗、无知、自卑感、不敬和乡下人的做作,然后再予以清除,他以这种手段解放了后代诗人。^③他的新田园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爱尔兰乡村,而是致力于打破地区主义的桎梏,因而具有极大的普世性。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是爱尔兰文艺复兴^④的舵手,卡瓦纳则成为 20 世纪爱尔兰北方文学复兴的一位鼻祖,爱尔兰田园诗的代表性人物。北方文学复兴开始于 20 世纪中期,既包括以卡瓦纳为代表的南阿尔斯特作家,也拥有以希尼为首的出生于北爱尔兰的一群作家,他们恪守爱尔兰文化传统,挖掘本民族、本地区的特色,在诗歌等领域

① 转引自 Terry Gifford, *Pastoral*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8.

② Jonathan Allison, *Patrick Kavanagh: A Reference Guide* (New York: G. K. Hall, 1996), p. 13. 转引自 Jonathan Allison, “Patrick Kavanagh and Antipastoral”,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Irish Poetry*, ed. Matthew Campb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

③ 详见 John Wilson Foster, “The Poetry of Patrick Kavanagh: A Reappraisal”, in *Poetry Criticism*, Vol. 33, eds. Elisabeth Gellert and Ellen McGeagh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1), p. 104. (后文中 *Poetry Criticism* 简称为 PC)

④ 爱尔兰文艺复兴指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爱尔兰文学人才辈出的现象,它与政治上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爱尔兰盖尔语文学遗产重新燃起的兴趣紧密相连。文艺复兴早期的领导人写下的诗篇歌颂爱尔兰伟大的过去,并带有盖尔语诗歌的音乐感和神秘感。详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 2 版·修订版)第 8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7 页。

取得了巨大成就,巩固了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成果。卡瓦纳虽出生在爱尔兰共和国,但也是一位阿尔斯特诗人,与希尼等人一起创建的阿尔斯特诗派,是北方文学复兴的主体。爱尔兰诗歌愈加繁荣,其风头一度盖过了传统诗歌大国英国。依旧有统治地位的爱尔兰田园诗甚至反田园诗模式表明当时的爱尔兰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仍旧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体,其当务之急还是乡村,并持续致力于自然和环境。

正如乡村被边缘化一样,卡瓦纳这位乡村缪斯也备受冷遇,他浓重的反主流意识形态、反殖民主义思想也让英国评论家对他敬而远之,正如他在《诗歌选集》“作者按语”中所说的那样:“英国评论家从来都不太把我放在心上。”^①然而,他的价值是无从抹杀的,他虽然不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但在爱尔兰、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中却享有盛名。他敢于描写最卑微的田园景象,揭示其中被漠视的价值,这必然引起那些草根阶层、弱势群体的共鸣,也难怪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总是绵延不绝。

很多评论家认为卡瓦纳是继叶芝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之一。他生前被称誉为“农民诗人”,但这一称号却不为他所喜,因为它认可的不是他诗歌的原创性和品位,而似乎是把 他看作一位来自爱尔兰乡村的自学成才的诗人,令人有些信不过。但约翰·乔丹却认为:“他可能是出自爱尔兰的第一位从琐碎空间里找到大爱的诗人。”^②艾伦·沃纳进一步认识到:“卡瓦纳不仅仅是一位土豆地里的诗人,也属于都柏林。他了解,并且哀叹波希米亚丛林里所有的骚动和齷齪。”^③可见,虽然他在世时作品和为人引起了很多争议,但诗歌的价值和影响力已为批评家所洞见。随着他的去世,以及偏激的、容易得罪人的个性被渐渐淡忘,对他诗歌认可的评论逐渐增加。他被认为是爱尔兰的彭斯、脚趾缝里夹

① Patrick Kavanagh, author's note to *Collected Poems* (London: Martin Brian & O'Keeffe Ltd., 1972), p. xiii.

② John Jordan, "Mr. Kavanagh's Progress", in *PC*, eds. Elisabeth Gellert and Ellen McGeagh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1), p. 64. First published in *Studies: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49, 195 (Autumn, 1960): 295-304.

③ Alan Warner, "A Poet of the Countryside", in *PC*, eds. Elisabeth Gellert and Ellen McGeagh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1), p. 68. First published in *Review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3 (July, 1964): 79-86.

着畜粪的耕童(ploughboy)诗人^①和“穷人的历史学家”^②。卡瓦纳的诗歌选集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肥沃土壤。卡瓦纳虽然认为“农民诗人”这一头衔降低了他的诗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他所撰写的反映乡村风土人情的田园诗造就了他,这些诗作因此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在《帕特里克·卡瓦纳诗歌中的田园诗设计》^③一文中,伊门·格雷南认为卡瓦纳的很多诗歌属于一种异质性的基督教田园诗。他把卡瓦纳的田园诗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卡瓦纳在与田园诗传统最初接触时,是一位亚当-诗人、一位诗人-耕者,而不是诗人-牧童。他承继华兹华斯、克莱尔的田园诗传统,向往人类堕落前的童年乐土,以自然、神秘和宗教等术语表现了这一乐园的存在。这是伊甸时间,夏娃还没有被侵害。诗人是天使的邻居。耕地这一行为成为神圣的仪式,世界钝涩的金属变成了具有幻景之乐的黄金。《大饥饿》(*The Great Hunger*, 1942)则代表了卡瓦纳田园历程的新进展,他的田园诗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反田园诗阶段。幻景的闪光依然存在,但却断断续续的,消失在组成这首诗核心主题的泥土的阴影中。这首诗可被称为“悲剧田园诗”,它描述了土地无情的现实,“泥土的预言”在不育和恐惧中砰然关闭了田园伊甸的大门。卡瓦纳从伊甸园自我流放,移居都柏林,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的田园理想——乡村世界成为充斥着精神饥渴、性饥渴、不育的反田园,他也成为一个讽刺家,然而讽刺家的身份亦属于传统的田园诗设计,正如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牧羊人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 1579)和弥尔顿的《利西达斯》所体现的那样。这个时期的其他诗歌,同样表现出失掉天真乐园导致的精神痛苦。新耶路撒冷被“仇恨城”取代,伊甸园则是凶险的丛林。反田园的语境其实更彰显出诗人对乐园强烈的追求。1955年标志着卡瓦纳田园诗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他开始了从反田园向田园化的回归,从“失乐园”到“复乐园”——弥尔顿所谓的“内心乐园”——的跃进。但他的田园诗设计不是一个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他主张“睿智的消极”(wise passivity),即“无名的卑微”(anonymous humility),一种纯粹的存在状态,远离经验,而不是在经验之前的、

① William A. Fahey, "Patrick Kavanagh: A Comment", in *PC*, eds. Elisabeth Gellert and Ellen McGeagh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1), p. 77. First published in *Renascence*, Vol. 21, 2 (Winter, 1969): 81-87.

② Antoinette Quinn, *Patrick Kavanagh: A Biography* (Dublin: Gill & Macmillan, 2001), p. 211.

③ 详见 Eamon Grennan, "Pastoral Design in the Poetry of Patrick Kavanagh", in *PC*, eds. Elisabeth Gellert and Ellen McGeagh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1), pp. 117-122. First published in *Renascence*, Vol. 34, 1 (Autumn, 1981): 3-16.

彻底而实际的天真状态。这是一种囊括一切的状态——既不是超验的,就像他最早幻想的情境,也不是排外、脆弱的,就像对失去的伊甸的纪念性再现。卡瓦纳恢复了眼前的乐园,并因处于完全的放弃状态而不再容易被摧毁。诗人发现,包容,而非排外,是超越一切的原则。这种螺旋式发展的田园诗历程的要旨就是爱。格雷南以精辟的分析,把卡瓦纳的田园诗合乎逻辑地划分成三个有着内在联系但并非互相重叠的阶段。但他的评论似乎忽略了卡瓦纳田园诗中的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尤其是对爱尔兰天主教制度的抨击。而卡瓦纳的城市诗歌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田园诗范畴。

在《帕特里克·卡瓦纳的〈大饥饿〉中的性和喜剧》^①一文中,肖恩·霍利迪讨论了该诗的喜剧因素,以及主要人物象征性的阉割状态。《大饥饿》中的主人公帕特里克·马圭尔,由于母亲的压制而老大未婚,并因此变得女里女气,像个太监一样。霍利迪认同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即卡瓦纳的长诗《大饥饿》是20世纪一首伟大的田园诗,因为它对已基本消失的爱尔兰乡村生活给予了现实主义的描述。霍利迪认为诗中的主人公马圭尔是卡瓦纳版本的现代爱尔兰反英雄。都柏林世故、庸俗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作家把卡瓦纳定位为“纯正的”农民诗人。同时代的批评家喜欢那些对懦弱农民生活的现实描画,欣赏卡瓦纳对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观察。使很多人沮丧的是,卡瓦纳一反复兴运动作家对爱尔兰的诗意歌颂,用《大饥饿》给这些批评家以迎头痛击。在形式方面,霍利迪认为卡瓦纳在诗中运用了高雅风格和低俗风格:高雅风格指的是教授、学者和诗人运用的标准英语,卡瓦纳运用高雅风格讲述人物重复、乏味和简单的生活方式,使得故事的悲剧意味被削减,并增加了一丝幽默感;低俗风格指的是爱尔兰人讲英语时的土话,村民那乡土味十足的习语和笨拙、不清晰的句式,制造出很大的喜剧效应。他在诗中不时插入的话语和读者的误解,使得诗歌的主角帕特里克·马圭尔既是一个笑柄,也是一个英雄。霍利迪认为,这首诗并非一些评论家认为的反田园诗,而是一首真正的田园诗,其根据正是卡瓦纳所运用的高雅风格,以及他在诗中对马圭尔自身价值的肯定。而马圭尔对乡村平凡物象的非凡感悟,在卑微自然中窥见神圣的慧眼,都使他超越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凡夫俗子。但霍利迪把马圭尔当作笑柄则不够妥当,恐怕这也不是卡瓦纳的初衷。

霍利迪认为《大饥饿》是田园诗,这似乎消解了反田园诗的存在。论者一般

^① 详见 Shawn Holliday, "Sex and Comedy in Patrick Kavanagh's *The Great Hunger*", in *PC*, eds. Elisabeth Gellert and Ellen McGeagh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1), pp. 163-167. First published in *Notes on Modern Irish Literature*, Vol. 7, 1 (Spring, 1995): 34-40.